

我憶鄧小平

牙力達

二〇〇九年九月



有限公司

111
013

464

我憶鄧小平

于光遠

二〇〇四年九月三日

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HS

Recalling Deng Xiaoping

By Yu Guangyuan

Time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Limited Co., Ltd.

First edition published in January, 2005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九風文化

九思實錄書系

我憶鄧小平

著 者：于光遠

出 版 者：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干諾道中 200 號信德中心西翼 3204 室

電子郵件：zeus-culture@126.com

承 印：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

地 址：香港健康東街 39 號柯達大廈二期 4/F02 室

出版日期：2005 年 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 價：HK\$76/NT\$308

ISBN：988-98282-1-9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印刷公司調換

目 錄

寫在前面.....	1
組建政研室的提議.....	2
建室.....	9
第一次見面.....	12
分 工.....	17
“讀文件”.....	19
收集和轉送材料.....	26
人員和機構.....	33
代管學部和籌辦《思想戰線》.....	43
長遠規劃會和《工業二十條》.....	54
《科學院工作彙報提綱》.....	68
《論總綱》.....	84
轉劉冰等人的信和“批鄧”.....	92
揭批“四人幫”.....	102
政研室存廢問題.....	111
轉 機.....	116
第二次復出與政研室命運.....	125
科學和教育座談會.....	135
抓科學教育的幾件事.....	144
更 名.....	158
關心和指導按勞分配的文章.....	171
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	183
東北講話.....	194
在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	205
跋.....	234

寫在前面

這是一本回憶錄，回顧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和我本人在鄧小平領導下工作的一段經歷。

說起我同鄧小平的接觸，“文化大革命”前很少。現在記得起來的，祇有這麼幾件事。

一件是一九五六年九月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是大會秘書長。大會發言由他主持安排，發言稿一般都經過他審定。這次大會有口頭發言和書面發言，會前準備的發言稿很多，有一百八十多篇。會上有六十八人作了發言，四十五人作了書面發言。我也準備了發言稿，主要談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問題，被他安排在大會發言。

一件是上個世紀五〇年代中蘇兩黨展開意識形態大論戰，從一九六三年九月至一九六四年七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連續寫了九篇評論文章，就是著名的“九評”。這件事是由鄧小平領導的，我也參加了其中一篇的寫作工作。

還有一件是一九六三年底，我和韓光、範長江等隨聶榮臻去中海頤年堂，向毛澤東彙報第二個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那天的彙報，劉少奇、鄧小平也在場。記得那天正逢羅榮桓元帥病逝，一開始，毛澤東提議大家肅立，為羅榮桓默哀。彙報中，毛澤東提到社會科學也要有一個十年規劃，社會科學也要投一點資。鄧小平也對此講了意見，我在鄧小平講話時，還插說了一句為社會科學工作爭取更多經費的話。

同他有比較多的直接接觸，是“文革”後期以後。一九七五年，重

新復出的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組建了一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已經多年“靠邊站”的我，調到這個機構，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這個機構合併到中央辦公廳。這四年，除了“批鄧”的一年多時間外，政治研究室一直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的“秀才班子”。一九七七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人也有了改變，祇有胡喬木、于光遠和鄧力羣三人。在這個時期，又有許多重要的事情可記，尤其是我以國務院研究室代表的身份參加一九七八年中央工作會議，並且列席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今年是鄧小平一百歲華誕。爲了紀念他爲我國改革、開放和建設做出的重大貢獻，我就親身的經歷，把自己所見所聞寫了這樣一本書。我作了一番仔細的回憶，又利用了我自己保存的資料，努力做到沒有重要的遺漏。在書中我還把一些照片，插在有關的章節裏。我想這樣做，可以給讀者一種更加親切的印象。

組建政研室的提議

一九七五年六月，記不清楚是哪一天，我忽然接到胡喬木的電話，約我見面。

這個電話很意外。在這之前，我同胡喬木見最後一面還是一九六一年的事。那年年初，胡喬木奉毛澤東之命帶一個調查組去湖南農村調查，我是這個調查組的成員。三月，中央在廣州開工作會議，胡喬木和我都參加了。會後，他和我各奔東西。後來知道，會後不久他就去外地養病，再也沒有見過面，直到“文革”爆發。“文革”開

始後，他和我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了。在紅衛兵、造反派召開的多次批判“走資派”的大會上，我作為“陪鬥”，見過彭真、陸定一、張聞天、薄一波等人，但是從沒見過胡喬木。一晃十四年，彼此音訊全無，忽然接到他的電話，而且要我去見面，我著實猜不透是怎麼回事。

見面後，看到胡喬木的面孔沒有多大變化，我想我自己也會是這樣。熟人見面總免不了寒暄幾句，但我同他從來沒有聊過天。他不喜歡聊天，我喜歡聊天，但不喜歡同他聊天，因此那天祇說了幾句就進入正題。而這個正題，更讓我意外。



一九七五年上半年，于光遠（右一）和林乎加（左二）在遼寧調查時合影

胡喬木告訴我，現在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考慮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爲他服務，做調查研究和思想理論方面的工作。他說，這個工作很有意義，鄧小平已經找過他，他也已經決定參加這個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參加。“文革”以來，我已經有九年沒有工作，這年上半年，林乎加（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要我到國家計委做些帶研究性的事情，但祇不過是當“客卿”。現在有這樣好的一個工作讓我去做，我當然很高興。

胡喬木還告訴我，鄧小平考慮，爲了工作方便，把這個研究室設在國務院而不設在黨中央。寫到這裏，我想說明一個情況，很多人以爲鄧小平從一九七五年初開始就主持黨中央、國務院工作了，不少書



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領導進行各方面整頓，同江青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和文章也這麼寫。其實並不確切。這年年初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後，鄧小平作爲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而這時主持黨中

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鄧小平是7月初才開始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胡喬木沒有說明為什麼這樣才方便，不過我一聽就明白：那時，王洪文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意識形態的幾個黨中央部門更是控制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裏，這個政治研究室歸屬黨中央，將很難展開工作。

建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由來，我後來才知道了更多一些情況。

鄧小平有這個想法是在這年年初，但是一開始並沒有說成立政治研究室，而是說要找一些人當顧問。這年一月六日，鄧小平約胡喬木談話，考慮找胡喬木、吳冷西、胡繩、李鑫等人當國務院顧問，像過去“釣魚臺的班子”那樣寫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釣魚臺的班子”是指“文革”前在中蘇論戰過程中中央組織的寫作班子，這個班子由鄧小平領導，常住釣魚臺，“九評”就是這個班子寫的。鄧小平還出了一些題目，如三個世界的劃分、蘇聯的社會性質、戰爭與和平問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問題，也說到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指示。鄧小平說：“這些問題都是國內外廣大羣衆迫切需要系統解答的。從‘九評’以後，就很少那樣系統地解答問題的文章了。現在的一般文章，總之一句話，就是沒有論證。”

胡喬木說這些工作很重要，不過他做不合適，因為他的問題還沒有做結論。鄧小平說，你的問題實際上已經做了結論嘛！鄧又說，寫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帶一些徒弟，組織一個寫作班子。胡喬木說，情況很不瞭解，聽說寫作班子比較有成績的，大概數北大清華大批判組、上海市委寫作組、北京市委寫作組，是否設法從他們中間選調一些人？鄧小平聽了，先是沈默不語，接著轉換了話題。鄧還囑咐胡喬木，他所談的這些中央和國務院還沒有討論，祇是隨便交換意見。

鄧小平找胡喬木談話的前一天，一月五日，中央發出了這年的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前，毛澤東還提議鄧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黨中央副主席。鄧同胡喬木談話三天後，一月八日至十日，黨中央舉行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召開，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同“文革”前相比，鄧小平所擔負的職務更多了，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職務是鄧過去未曾擔任過的。這說明鄧小平將在中央最高領導層負起主要責任。作為承擔如此緊要和繁重工作的領導人，鄧自然需要一個“秀才班子”，而中央當時並沒有一個現成的這樣的班子。胡喬木所說的北大清華大批判組、上海市委寫作組、北京市委寫作組，在當時倒真是聲名顯赫、炙手可熱，它們的筆名“梁效”、“羅思鼎”、“洪廣思”家喻戶曉。但是這些班子都是由“四人幫”或者“四人幫”的勢力掌控的，鄧小平怎麼可能用這樣的寫作班子呢！

不知什麼原因，鄧小平同胡喬木談話之後，組織寫作班子這件事拖了幾個月。也是後來才知道，這年上半年，鄧小平同“四人幫”進行了一場政治較量，也是他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後同“四人幫”的第一輪較量。

“組閣”失敗的“四人幫”，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之後不久，便打出批判“經驗主義”的旗號，宣稱“現在的主要危險不是教條主義，而是經驗主義”，“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當前的大敵”，把矛頭指向已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四月十八日，鄧小平借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的機會，向毛澤東反映了江青等人大反“經驗主義”的情

況，並且明確表示不同意“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說法。毛澤東贊同鄧小平的意見。四月二十三日，毛在姚文元轉送的一份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祇提一項，放過另一項。”還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毛的批示還要求將這個問題“提政治局一議”。



一九七四年，毛澤東同鄧小平握手

四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葉劍英、鄧小平在會上批評了江青、張春橋等人大反“經驗主義”的錯誤，並且批評他們自一九七三年以來多次發難、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的行徑以及他們的宗派

活動。江青等人認為會議是對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圍攻”，是一九七〇年“廬山會議的再現”。王洪文寫信給毛澤東，攻擊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江青還給毛澤東處打電話。五月三日，毛澤東自己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表示：“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毛還明確批評了江青等人：“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據說，這是毛澤東主持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發了話，支持了周恩來、鄧小平。

五月二十七日，經毛批准，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鄧小平作中心發言，強調毛主席提出政治局要安定團結、“三要三不要”，是很重要的原則問題，需要好好討論。鄧還駁斥了江青等人對4月27日政治局會議的指責：有人說這次會議的講話“過了頭”，還有人講是“突然襲擊”、是“圍攻”。其實，百分之四十也沒有講到，有沒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鄧說：這裏有三件事需要講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會議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後門”，三是學理論又提出批“經驗主義”。倒是問一問，這是為什麼？不講明白，沒有好處。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繼續批評“四人幫”。鄧最後表示“講多少算多少”，還要將會議情況報告毛。

幾天後，鄧小平利用陪同毛會見外賓的機會，向毛澤東彙報了政治局開會的情況。毛表示：“我看有成績。把問題擺開了。”還說：他們幾個人現在不行了，反總理、反鄧小平、反葉帥。現在政治局的風

向快要轉了。毛對鄧說：“沒有大問題。你要把工作幹起來。”鄧表示：“這方面我還有決心就是了。反對的人總有，一定會有。”毛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發生了這場較量，鄧恐怕一時顧不上組建寫作班子的事情。毛澤東同鄧小平的一番話，算是對這次較量作了個總結。顯然，鄧在這個回合占了上風。

這一輪較量有了眉目，鄧騰出工夫來，又開始考慮寫作班子的事。六月八日，鄧小平再次找胡喬木談話，重提此事。這次鄧小平說不要叫“顧問”了，打算成立一個政治研究室。鄧要胡喬木提出這個政治研究室的名單，胡喬木加上了于光遠。

六月十五日，鄧小平在寫給當時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附了一段話：“另，國務院設政治研究室，先由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于光遠、李鑫等同志組成，以後再吸收一些人，特別是年青一點人，培養作理論工作。此事亦請一併提政治局審議。”

胡喬木找我談話是在鄧小平寫信之前還是之後，我已記不起來了。不過，不久以後中央就下發了成立政治研究室的通知。

建 室

一九七五年七月五日，國務院發出政治研究室負責人的正式任命。日子記得這麼清楚，是因為那天恰好是我六十歲的生日。從這天起，政研室算是正式建立，我算是正式恢復工作。對我來說，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

政研室的負責人一共七位。前面說的鄧小平寫的那封信祇提到六位，後來又加上了鄧力羣，排名順序是胡喬木、吳冷西、胡繩、熊複、于光遠、李鑫、鄧力羣。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寫有關回憶文章，都將李鑫排在這個名單的最後，後來翻了資料才知道，李鑫和鄧力羣的次序應該倒過來，鄧力羣排在最後。

除我自己外，政研室的其他六個負責人都是我的熟人。胡喬木不必說了，他是我的老同事，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到延安的第二天便同他見面，彼此相識。以後，我和他先後在中央青委、中央宣傳部共事。我在中央青委時，他是中央青委的宣傳部部長；我在中央宣傳部時，他又曾經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這兩個單位，他都是我的領導。

吳冷西在“文革”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職務是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後來還兼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雖然不是中央委員，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員的地位重要得多。中央高層的許多會議他都列席，毛澤東經常找他，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經常可以看到他的名字。“文革”中他被列為打倒的對象，但即便是作為被打倒的對象，毛澤東對他也特別“關注”，說過“陳伯達的鐵掃帚不到，吳冷西及其一夥的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這樣的話。

胡繩在建國初期是中央宣傳部幾個副秘書長之一，他和我的關係更密切了。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寫過一本“暢銷書”——《社會科學基本知識講話》。我在中宣部任科學處副處長時，他兼正處長。

熊複在抗戰前是“民先隊”成都地方隊部的隊員，成都地方隊部的隊長是韓天石。當時我在“民先隊”全國總隊部，負責同各地“民先隊”隊部聯繫，同成都隊部聯繫是比較多的，不過我沒

有同熊複聯繫過，祇同韓天石聯繫過。“文革”初期，“砸爛閻王殿”，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時，熊複被派到中宣部當了一名副部長。那時陶鑄兼任中宣部部長，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鑄被打倒後，熊複便也成了中宣部的“新閻王”之一。一九六九年我們一起去了寧夏中宣部五七幹校，成了“同學”。大家都是“走資派”，又有歷史關係，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間同他聊天。

李鑫是康生的秘書。他原來在教育部工作，我並不認識，後來康生看上了他，調到身邊當秘書，我才在康生家經常見到他。

鄧力羣也很熟，在延安時他就“有名”。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他調到《紅旗》雜誌社工作，任副總編輯。我主持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康生提名我和鄧力羣負責，因為共同做這項工作，我們曾有不少接觸。又因為《紅旗》雜誌社用了中宣部蓋的大樓的一部分，我們還成了鄰居。“文革”中我們被勒令“勞動改造”，一起坐卡車到城外卸垃圾。押送我們去勞動的紅衛兵坐在駕駛室裏，我們兩個“走資派”坐在垃圾車上，有機會不受監督地閒聊過。

在這樣一個全是由熟人組成，而且由除李鑫外都是“文革”中的“走資派”組成的機構裏工作，我覺得一定是會很愉快的。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政研室有這樣一個陣容真是不尋常。不是有大手筆的鄧小平敢於起用這些人，這些人是不會聚集到這樣一個機構中來的。而且，這樣一個機構，就在“鋼鐵公司老闆”鄧小平的領導下。這在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看來，的確是一支可怕的力量。何況這個機構是在江青一夥受毛澤東批評，他們的“小兄弟”王洪文從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上被冷落之後成立的呢！

七個人的職務都沒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義，祇叫“負責人”，胡喬

木排在最前面，當然是主要負責人。我理解，這表明七個人的任命還帶有臨時性質。這個“臨時性質”意味著什麼？鄧小平是考慮還要改變名稱或是改變歸屬，還是爲了別的什麼，當時我沒有想明白，也從來沒有問過胡喬木。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弄清楚，想明白。

順便交代一下，在中央的正式通知發出之前，政研室實際上已經開始工作了。六月下旬，胡喬木就召集政研室幾位負責人開會，傳達鄧小平的指示，說政研室是國務院的直屬機構，主要任務是撰寫反修文章，像過去釣魚臺寫作班子那樣。胡喬木還說，鄧小平已經出了幾個題目，要收集大量材料，寫出系統的有充分說服力的文章。鄧小平還說，我們報刊上多年來已沒有這樣的文章，現在的文章，祇有結論，沒有論證，不能說服人。鄧小平這番話批評的是當時流行的文風，不過我們心裏清楚，其矛頭是對著把持意識形態領域的“四人幫”的。

第一次見面

政研室負責人的任命下達後第五天，七月九日，鄧小平第一次召集政研室負責人集體談話。忘了什麼原因，這次集體談話鄧力羣沒有參加。

“文革”前我同鄧小平接觸很少。“文革”爆發後，他被作爲黨內第二號“走資派”打倒，我更沒有可能再見到他。一九七三年他重新出山，我也祇是從報紙上和廣播裏知道他的消息，沒有見面的機會。得知他要召見我們，我心裏想，經過九年磨難，他

會變成什麼樣呢？

鄧小平微笑著對每個人點頭，同每個人握手。坐定後我仔細端詳他：神采不減當年，不見帶一點憔悴，九年滄桑沒有刻在他的臉上。他簡單問了問每個人的情況，然後傳達了毛澤東關於百花齊放和文藝工作的指示。這個月初，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特別批評“百花齊放都沒有了”，說“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這次談話前後，毛澤東還有個關於周揚問題的批示。六月份林默涵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對黨中央宣佈對他解除監護、恢復自由的感謝。林“文革”前先是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後來又當了副部長，分管文藝工作，同早已是副部長、一直主管文藝工作的周揚工作關係密切，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文革”中被牽連到周揚的案子裏。七月二日，毛澤東對林默涵的來信作了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久關不是辦法。請討論酌處。”毛澤東的談話和批示，是對極左文藝政策的某種鬆動。現在看來，鄧小平顯然是敏銳地感到了這是調整文藝政策的一個契機。

傳達毛的指示後，鄧小平說，除百花齊放外，還有一個百家爭鳴的問題。他說，要防止僵化。現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雙百”方針沒有貫徹執行，文學、藝術不是更活潑、更繁榮。這比毛澤東對極左文藝政策的批評又進了一步，是對毛澤東談話的發揮。

這次談話，鄧小平還談到了科學技術工作。他說，現在對基礎理論不重視，祇搞應用科學，這樣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不行。

關於政研室的任務，鄧小平要政研室收集一些關於文教方面執行